

散藏敦煌遺書所見題跋輯錄與研究

——以許承堯舊藏題跋為例

朱鳳玉

一、前言

敦煌寫卷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發現，但因時空背景等諸多因素，以致未能及時系統完整的保存，而流散世界各大圖書館，乃至公私收藏，徒增學界之遺憾與研究上之困擾。近年學者關注的焦點開始投向散藏敦煌寫卷蹤跡的追尋，我則致意於散藏寫卷的題跋。

散藏敦煌寫卷「題跋」，有的記敘寫卷收藏過程；有的品評寫卷書法字體且偶加斷代；或考論寫卷內容，評論其價值。其學術價值，每有不容小覷者。2014年草擬《散藏敦煌寫卷題跋之輯錄與研究》專題計畫，獲科技部補助¹，執行過程中，益發覺得散藏敦煌寫卷題跋實有輯錄與研究之必要。今以許承堯舊藏敦煌寫卷題跋為例，進行輯錄，並據以研究其內容，分析歸納其涉及之問題。

二、許承堯的生平及其敦煌藏卷

許承堯是清末民初的詩人、書法家、方志學家及文物鑒賞家，喜愛收藏古物。任職甘肅期間，收集不少珍貴敦煌寫本，尤其書法古雅精美之晉魏隋唐經卷，對藏卷多施加品題；而他個人書法作品也深受唐人寫經之影響，風姿綽約，流暢大方。其題跋既是個人書法藝術的呈現，又是對寫卷書法的鑒賞與品評，且涉及敦煌寫卷流傳等諸多議題。

（一）許承堯的生平及其敦煌寫卷收藏的來源與流向

許承堯（1874-1946），一名芑，字際唐，又作霽唐，號疑庵、悔庵、侯龔等，晚年別號芑父、芑叟，安徽歙縣人。出身商賈之家，少年隨邑中汪宗沂學，與潭渡的黃

¹計畫名稱：『散藏敦煌寫卷題跋之輯錄與研究』，MOST 103-2410-H-415-029-MY2，執行期間：2014.08.01~2016.07.31。

賓虹同窗。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中舉，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科進士，欽點翰林，授庶起士。民國二年（1913）冬受甘肅都督張廣建（1864-1938）聘請，赴隴任甘涼（今甘肅張掖）道尹。任官西北十年，收集唐人寫經甚豐。後辭官返鄉，致力於鄉幫文獻之搜集。1926年至1937年，任縣誌總修纂，編修完成長達百餘萬字的《歙縣誌》，並著有《歙故》、《歙事間談》等。晚年寓居上海，撰寫紀遊詩，出版有《疑庵詩集》。工書法，其書有唐人風格。

許氏生平，有後人所撰《許疑庵先生事略》²可資參考；鮑義來、余欣、梁芬等亦對其收藏與學術概況有所論述³，茲不贅述。

許承堯舊藏寫卷的來源與流向，始終是學界關注的焦點。據余欣調查，其來源主要有三：市肆中購買，孔憲廷等同僚贈予，廷棟案接收。至於其舊藏流向：1924年許氏辭官回歙縣故里，曾將帶回敦煌寫卷，挑選出書法最佳及帶有題記紀年的精品40件，度藏老家大廳樓上，並命名為「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其餘則或贈予長子許家栻，姪女悅音，友人馬其昶、陳闡、黃賓虹、唐式遵，及學生吳綺川、吳博全、一塵等人；或與友人交換；更大部分則售予葉恭綽、龔釗及日本中村不折等人。1946年許氏逝世後，家人謹遵其遺囑，將所有藏品，包括書、畫、書籍及手稿悉數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⁴。

（二）許承堯舊藏的敦煌寫卷

許氏舊藏敦煌文獻究竟多少？其自言：約二百卷。時人或言近三百卷，或言六百卷、或言千餘卷⁵，眾說紛紜。然據許氏舊藏寫卷題跋所提及，均言二百卷，當指許氏早年甘肅訪購的卷數。至於其蒐羅所得究竟多少？應不止此數。

許氏舊藏幾經易手，輾轉流散，據余欣調查，其舊藏寫卷所在，涉及安徽省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臺北國家圖書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書道博物館、大阪杏雨書屋、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²見許克定、許克寶《許疑庵先生事略》，《歙縣文史資料》第2輯，歙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1987年出版。

³鮑義來《許承堯與敦煌遺書拾掇》（《檔案》，2001年第5期）、余欣《許承堯舊藏敦煌文獻的調查與研究》（《敦煌學·日本學——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紀念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151-192。）、梁芬《許承堯生平與學術概述》（《黃山學院學報》14卷1期，2012年1月，頁8-23。）

⁴歙縣檔案館館藏許承堯捐贈文物清冊，共三冊，174張（實為348頁），4075條目錄，2萬餘冊（件）文物。

⁵水梓（1884-1973）甘肅蘭州人，原籍浙江，清末貢生，甘肅著名教育家，擅書法精詩文。言共有六百卷。（說見水梓《張廣建督甘時期的見聞》，《甘肅文史資料》第2輯，1963，頁30-31）；周廷元說約有一千餘卷。（說見周廷元《編目贅言》載《周廷元敦煌寫經守殘留影》，《責善半月刊》1卷14期，1940.10，頁2-4）。

(Freer Gallery of Art) 等 14 個公私單位，總計 42 件。我在其基礎上，重新詳加檢索，計得鈐有許承堯相關印記或題跋之敦煌文獻 69 件，分別收藏於 23 處。卷數與許氏舊藏總數顯有差距，或有尚未公布，或未經辨識者，更有不知去向者。尋檢所得如下，凡余欣文章提及者於前加「*」識別之：

- (一) 安徽省博物館藏 7 件：* 1.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七、* 2. 《大般涅槃經》卷三三、* 3.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卷一、* 4. 《二娘子家書》、* 5. 《大隨求真言啟請》、* 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九〇、* 7.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
- (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7 件：* 1. BD14504 (北新 0704)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二七、* 2. BD14514 (北新 0714) 《大般涅槃經》(北本) 卷二五、* 3. BD14573 (北新 0773) 《大寶積經節抄》、* 4. BD14635 (新 0835) 《增壹阿含經》卷四七、* 5. BD14739 (北新 933) 《十誦律疏》、* 6. BD15125 (新 1325) 《法句經》卷上、7. BD15368 (新 1568) 《妙法蓮華經》卷五。
- (三) 上海圖書館藏 9 件：* 1. 上圖 016(812379) 《歡喜國王緣》、2. 上圖 030(812408) 《大智度論釋十無品》、* 3. 上圖 040 (812447) 《金光明經》卷一、* 4. 上圖 042 (812449) 《大智度論》卷八一、* 5. 上圖 043 (812450) 《妙法蓮華經》卷四、* 6. 上圖 067 (812509) 《華嚴經》卷三十三、* 7. 上圖 068 (812510) 《孟蘭盆經贊述·溫室經疏》、* 8. 上圖 078 (812525) 《太玄真一本際經》卷二、* 9. 上圖 100 (812548) 《大乘入楞伽經無常品第三之餘》。
- (四) 上海博物館藏 1 件：* 1. 上博 36 (37497) 《妙法蓮華經》卷一
- (五)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1 件：* 1. 北大 D063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
- (六)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5 件：* 1. 津藝 62 《妙法蓮華經》卷五、* 2. 津藝 74 (77.5.4416) 《佛說無量壽觀經》、3. 津藝 167 (77.5.4506) 《妙法蓮華經·從地湧出品第十五》、4. 津藝 180 (77.5.4519)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5. 津藝 206 (77.5.4545) 《大般涅槃經》卷十六、
- (七) 浙江省博物館藏 2 件：* 1. 浙敦 028(浙博 003) 《大智度論》卷七二、2. 浙敦 029(浙博 004) 《太子慕魄經》。
- (八) 青島市博物館藏 5 件：1. 《大般涅槃經》卷二殘卷、2. 《妙法蓮華經》卷一、3. 《毗尼律藏》、4. 《般若波羅蜜光讚經問品下》、5. 《維摩義記》。

- (九) 首都博物館藏 2 件：1.32.577 《佛說解百生怨家經》、2.32.57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十一。
- (十) 四川博物院藏 2 件：1.26. SCM.D.2159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2.30. SCM.D.29127 《妙法蓮華經》。
- (十一)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1 件：* 《大智度論》卷六五。
- (十二) 臺北國家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藏 4 件：* 1. 064 《妙法蓮華經》卷一五、* 2. 085 《大般涅槃經》卷一七、* 3. 095 《大智度論》卷六三、4.127 《瑜伽論手記》。
- (十三)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1 件：* 27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 (十四) 杏雨書屋《敦煌秘笈》藏 2 件：1. 羽 628 《佛說延壽命經》、2. 羽 771 《瑜珈師地論分門記》卷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合卷本。
- (十五)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8 件：* 1.132 《抱朴子》殘卷、2.133 《鄭注論語》殘卷、* 3.136 《南華真經知北遊品第廿二》、* 4.137 《春秋左氏傳》殘卷、* 5.105 唐寫《太上八威靈策》殘卷、* 6.139 《搜神記》一卷、* 7. 《律抄》一卷、* 8. 《法華經註》第一。
- (十六)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1 件：* 183-53 《妙法蓮華經》卷六
- (十七)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1 件：* 東大 4699 《四部律並論要用抄》。
- (十八)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1 件：* F1982.2 號《大般涅槃經》卷三三
- (十九) 啓功藏敦煌石室寫經殘字 3 則。
- (二十)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1 件：117 (XJ020-0660.01) 《妙法蓮華經》卷三
- (二十一) 中國嘉德 95 春季拍賣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二十二) 臺北戴勝山房：隋人書《十輪經》
- (二十三) 許承堯贈唐式遵的寫卷 3 件

三、許承堯舊藏敦煌寫卷題跋

以上 69 件舊藏寫卷中，有許氏題跋 23 則，含為他人藏卷撰寫之題跋一則。茲依館藏條列輯錄如下：

1. 安徽省博物館藏《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卷一，卷首有許氏跋。
2. 安徽省博物館藏《二娘子家書》另裱三冊頁，第一冊頁有許氏跋。第二冊頁節錄鄧之誠《古董瑣記》後有許氏跋。
3.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九〇，卷尾有許氏跋。
4.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涅槃經》卷三三，卷前題「最精北朝周齊時寫經七十九行」，為許承堯筆跡。有許氏另紙題跋。
5.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4514（北新 0714）《大般涅槃經》（北本）卷二五，有許氏題跋。
6.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4635（新 0835）《增壹阿含經》卷四七，有許氏題跋。
7.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5125（新 1325）《法句經》卷上，扉頁上有許氏題跋。
8. 青島市博物館藏《毗尼律藏》殘卷，卷末附有許氏八行箋題跋一紙。
9. 青島市博物館藏《維摩義記》殘卷，卷末有許氏跋。
10. 浙江省博物館藏浙敦 029（浙博 004）《太子慕魄經》，首紙有許氏題跋。
11.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27《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附有許氏手寫題跋二紙。
12. 上海博物館藏 23《佛說佛名經》卷尾有 1944 年許氏題跋。
13.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西域文獻遺珍》117《妙法蓮華經》，有許氏題跋。
14. 臺北戴勝山房藏隋人書《十輪經》，卷末尾題後有許氏跋。
15. 啟功藏敦煌石室寫經殘字冊子第二頁右側有旁注署『芑』，即許承堯。
16. 啟功藏敦煌石室寫經殘字第五頁左邊旁批亦出自許承堯。
17. 中國嘉德 95 春季拍賣會《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後有許氏題跋。

18. 日本大阪杏雨書屋藏羽 628《佛說延壽命經》，卷末表紙有許氏用「甘肅政務廳用箋」八行箋二張寫成的跋。
19.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132《抱朴子》殘卷，卷首拖裱題有「北朝人書抱朴子奇寶也。戊午冬疑龕記」下又「黃海芑父」方形硃印。並有題跋。
20. 《救疾經》許承堯 1940 年贈唐式遵。卷後有許氏題跋。
21. 許承堯贈唐式遵另一件有許氏 1941 年所寫的題跋。
22. 許承堯贈唐式遵《金書佛經》，有許氏題跋詩一首。
23. 唐式遵從別處得到《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一件，請許承堯鑒定並撰寫題跋。

四、許承堯舊藏敦煌寫卷題跋的價值

從以上 23 則題跋內容，可窺見許氏對敦煌寫卷書法精闢獨到之見解，其間亦有涉及早期甘肅地區寫卷流傳之情況，以及敦煌寫卷書寫風格、寫卷用紙等有關斷代議題之材料，具參考價值。茲分析歸納，論述如下：

(一) 呈現敦煌寫卷出自三界寺的主張

莫高窟藏經洞是 16 窟的耳洞，今編 17 窟。自敦煌文獻重見天日以來，藏經洞所在的石窟性質與寫卷時代問題一直深受關注。而藏經洞封閉的原因，自來有所謂「逃難說」與「廢棄說」的不同。其中逃難說又有「避西夏說」與「避異教徒進攻說」的差異；廢棄說也有「書庫改造說」與「神聖廢棄物說」的分歧，甚至有末法藏經說。無論如何，16 窟、17 窟是否屬於敦煌的什麼寺院，而石窟又是什麼性質的地方，才是根本說明藏經洞寫卷性質的基礎前提。

今所見許氏題跋中，有 9 則涉及對藏經洞的看法，許氏以為敦煌寫經乃敦煌鳴沙山古三界寺的寫經。如：1. 安徽省博物館藏《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題跋云：「敦煌鳴沙山古三界寺石室寫經」，3.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題跋：「此敦煌石室古三界寺唐人寫經」，4.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涅槃經》題跋：「燉煌鳴沙山，古之三界寺石室最精寫經七十九行」，11. 傅斯年圖書館藏《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題跋：「敦煌鳴沙山古三界寺石室出唐初精寫」，12. 上海博物館藏《佛說佛名經》題跋云：「因山為寺，名三界寺」，14. 隋人書十輪經題跋：「右隋人書十輪經七十五行，出敦煌鳴沙山古三界寺石室」，20. 《救疾經》題跋：「(鳴沙山)山有三界寺，因石為窟」。而 15. 啟功藏敦煌石室寫經殘字冊子題跋也說：「友人從

敦煌來，得此於古三界寺燬字爐旁。」當然誠如柴劍虹所說「『得此於古三界寺燬字爐旁』，其實是盜寶者掩耳盜鈴式的欺人之談」；不過卻也透露出寫卷出自三界寺是當地共同的認知。

按：三界寺是晚唐五代時期敦煌佛教教團的官寺之一。唐朝初年已經存在，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始漸活躍；五代時期三界寺與歸義軍政權關係甚密，寺名漸隆，尤其經過寺僧道真的努力，遂成為敦煌的名寺，更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莫高窟的主要寺院。北宋初期，敦煌地區信徒在三界寺受戒者甚多，敦煌文獻中保存有相當多的戒牒，多稱沙州三界寺⁶。

榮新江據敦煌寫卷相關材料，主張道真所在的三界寺位於莫高窟前；同時還根據藏經洞文獻、文物與三界寺藏經、供養具之間的種種聯繫，而以為：三界寺位於莫高窟下寺，即今藏經洞第 17 窟和 16 窟的前面，藏經洞出土的藏經就是三界寺的藏經，莫高窟的藏經便是三界寺的圖書館⁷。

許承堯題跋一再提及敦煌寫經出自鳴沙山古三界寺的石室，同時也還認為是昔日之圖書館。其說法與時下學者旁徵博引所得結論不謀而合。如：12. 上海博物館藏《佛說佛名經》題跋：「予以民國二年至皋蘭，適市時遇人求售，價頗廉，因遂購訪，先後得二百卷。分類整理，乃知其中不止唐人書，有元魏，有周、齊、隋，有五代，至趙宋太平興國止。最古者，有孫吳甘露年寫。知此室乃昔之圖書館，閉於宋初也。」許氏題跋說法自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可供早期甘肅寫卷流散情況之參考

發現莫高窟藏經洞的道士王圓籙，由於文化知識有限，不知道這些寫本珍貴的學術價值，因此，在寫卷發現之初，將一些精美的絹畫和完整的寫經，分送給敦煌縣衙中的要人以及當時地方名流，仕紳們又轉相贈送。敦煌寫本就這樣開始在早期的西北流散，也造成敦煌文獻聚散的複雜情形。

許承堯民國二年（1913）任甘涼道尹，前後在西北任官長達十年，正值寫卷於甘肅流散，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所得甚豐，在其所撰題跋中，每每敘及當時敦煌寫經在甘肅流散的情況，可說是研究敦煌寫卷初期流散之寶貴資料。如：20. 《救疾經》題跋中有：「光緒庚子年，寺之複壁忽圯，發現內窟中，藏晉魏隋唐迄北宋寫經

⁶參鄭阿財〈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探究——論敦煌三界寺的寺學〉，《華學》9、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頁 1040-1050。

⁷參見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3-48；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經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2004.5，頁 11-17，收入《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5，頁 25-47。

寫書卷軸極多，盈二鋸輪，並毳毼癩諸物。卷中紀年至太平興國止，以是推知此壁蓋扁閉於北宋初也。法人伯希和遊歷過此，喜出望外，擇其精異者捆載而去。英人踵至，亦有所得。於是敦煌石室之名，流播五洲。為清學部所聞，檄取其餘，儲之圖書館。然閱時既久，多所散佚，甘涼蘭州，時復見之。余遊隴時，數歲頓盡，今於西陲求片楮不可得矣。」¹²上海博物館藏《佛說佛名經》題跋云：「其深處石室崩豁於光緒庚子年，發見二大輪藏，卷籍極富。最先為英法游士捆載去。清學部乃遣人輦其寫經入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且皆精整。予以民國二年至皋蘭，適市時遇人求售，價頗廉，因遂購訪，先後得二百卷。分類整理，乃知其中不止唐人書，有元魏，有周、齊、隋，有五代，至趙宋太平興國止。最古者，有孫吳甘露年寫。知此室乃昔之圖書館，閉於宋初也。陳君季侃，至隴後予數年，時已漸罄，求索不易矣。」跋中說及清光緒庚子年（1900），三界寺石窟夾牆忽然倒塌，發現複壁中有石窟，內藏大量晉魏隋唐迄北宋寫卷卷軸，有紀年時代之下限為北宋太平興國，以是推知此壁蓋扁閉於北宋初也。英國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後前來捆載而去，以致敦煌文物流播世界。清廷學部聞風，收拾殘餘，歸藏京師圖書館。然閱時既久，多所散佚，甘涼蘭州，時有所見。許氏民國二年任職甘肅，於蘭州時遇人求售，多所購訪，價格頗廉。民國六年（1917）陳閻任甘肅蘭山道道尹，民國9年（1920），護理甘肅省省長。至甘肅時間較許承堯晚5年，當時甘肅流散的敦煌寫卷，坊間已漸售罄，求索已越來越不容易。

8. 日本大阪杏雨書藏《佛說延壽命經》題跋有云：「此卷為龔佛平前輩令張掖時所獲，余攬得之經，為顯德時賈彥俊所造。而太平興國時僧善明加題，尤為奇特。曩在京師方地山處，見一小卷，與此略同，後有題跋四、五行。渠為袁克定代購，索價至五百圓，其稀有可知。」按：許承堯《疑庵詩》中有〈題龔佛平同年蛻庵詩集二首〉⁸，同年是同榜錄取者的互稱。明清鄉試、會試同榜登科者也都互稱同年。許承堯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舉人，光緒三十年甲辰科進士。考清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進士表，許承堯為二甲第40名，同榜龔姓只有第82龔福燾，湖南省善化縣。龔福燾，湖南才子。又王海帆（1888–1944）⁹《戊辰消夏錄》載：「戊午夏，余以監督選舉事至涼州，識合肥龔佛平先生于甘涼道任內，過從甚密。」龔佛平為合肥人，與許承堯同為安徽人，許承堯詩題稱龔佛平為同年，則不是與許承堯進士同榜的龔福燾。至於合肥龔氏且於民國八年任官甘涼道者，疑即前述與敦煌寫卷收藏有關之收藏家龔心釗，然龔心釗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鄉試中舉，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進士，二者並非同年，龔佛平與龔心釗是否同為一人，仍有待進一步考訂。

⁸許承堯《疑庵詩》，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90。

⁹王海帆，原名永清，字海帆，以字行，號半船，又號梧桐百尺樓主人，隴西縣城種家巷人。有《王海帆詩集》、《王海帆文集》行世。《王海帆文集》附有《戊辰消夏錄》，亞洲聯合報業出版社，2004.6。

方地山（1871-1936），名爾謙，字地山，以字行，又字無隅，別署大方。江蘇江都人。清末民初學者，與弟澤山齊名文壇，世稱二方。清光緒十二年（1886）考中秀才，曾被袁世凱聘為家庭教師，袁世凱次子袁克文曾從之受業，後為兒女親家。雅好文物，尤以古泉為多。善書法及楹聯。清宣統二年（1910），自甘肅解送入京之敦煌寫卷抵達後，因其為李盛鐸之友，故得以與李盛鐸、劉廷琛同時截得敦煌寫卷。

袁克定（1878-1958），字雲台，別號慧能居士，外號袁大癩子，河南項城人，袁世凱長子，原配于氏所生。一件《佛說延壽命經》小卷，索價至五百圓，其稀有可知。

至於許承堯舊藏敦煌文獻究竟有多少？頗多傳聞或猜測之詞。許氏題跋中有不少提及遊隴期間蒐羅敦煌寫卷之情形，其自我表述，應屬可信。如4.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涅槃經》許承堯題跋：「予遊隴八年，先後得古寫經近二百經卷，唐最多，初唐即較希，隋以上尤希，其中精書更難得。」12. 上海博物館藏《佛說佛名經》題跋：「予以民國二年至皋蘭，適市時遇人求售，價頗廉，因遂購訪，先後得二百卷。」許氏自言約二百卷，其弟子吳博全的題跋也說近二百卷。如：11.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隨求得自在大陀羅尼神呪經》吳博全跋：「是卷乃先師許太史際唐所遺。先生游隴中八年，所收近二百卷，滿字極稀有，紀年可考者，四五本耳。矜重之至。」是二百卷當是許氏早年於甘肅訪購的卷數，至於之後所得及所見當遠超過二百卷，所以21. 許承堯贈唐式遵寫卷題跋才有：「承堯遊隴八年，所見鳴沙寫經達數百卷」，也因此時人會有言近三百卷，或六百卷、或一千餘卷¹⁰說法的出現，這是可以理解的。

（三）顯示許氏對敦煌寫卷書法精到之評隲

許氏喜愛收藏古物，也精於書法，酷愛晉唐寫卷。在甘肅時，收集唐人寫本藏經較多，以後又陸續收藏了不少珍貴書帖和繪畫作品，這批藏品的玩味提高了他的藝術表現力和鑒賞力，其個人的書法作品即受漢簡和唐人寫經的影響，風姿綽約，流暢大方。其收藏敦煌寫卷多書法精品，而題跋亦以寫卷書法之視角賞玩為多。在12. 上海博物館藏《佛說佛名經》題跋中有云：「予以民國二年至皋蘭，……先後得二百卷。分類整理，乃知其中不止唐人書，有元魏，有周、齊、隋，有五代，至趙宋太平興國止。最古者，有孫吳甘露年寫。」又21. 許承堯贈唐式遵寫卷題跋也云：「承堯遊隴八年，所見鳴沙寫經達數百卷，比勘所署年代，乃知有晉人書，有元魏北周北齊人書，有隋唐五代人書，至北宋初年為止。書法蛻變之跡，癡然可尋。確鑿可信，非向壁虛造，妄為高論也。」說明其廣搜訪購敦煌晉魏隋唐寫卷精品，從中考察書法蛻變之跡，可作其個人書法史論之確證，使其論述得以信而有徵，而不致淪為向壁虛造之空論。

1924年許氏辭官回歙縣故里時，將帶回的敦煌寫卷，挑選出書法最佳及有題記

¹⁰同注6。

紀年的精品 40 件，度藏老家大廳樓上，並命名為「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亦可作為其關注敦煌寫經字體書風在書法史的遞嬗變易與發展之力證。

許承堯論及晉人書跡的題跋，見於 7.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5125 《法句經》，其跋云：「此敦煌石室寫經之最古者，樸茂淵懿，直逼漢分。所見數千件，無出其右。余藏奇古者三件，無寫時題識。以日本人所得元康六年寫之《諸佛集要經》證，知為晉人所作，而較此不如。此件亦不著年代，要當在羲、獻以前。真可謂宇內鴻寶矣。」按：漢分，指的是漢代八分書，即漢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分變》：「西漢無挑法，而在篆隸之間者，名曰西漢分。蔡中郎說也。東漢有挑法者，為東漢分，總稱為漢分。王愔、張懷瓘說也。」日本人所得元康六年寫之《諸佛集要經》，是指日本京都西願寺第 22 代主持大谷光瑞派遣的『中亞探檢隊』，三次赴新疆吐魯番等地，獲取大量的珍貴文物。其中《諸佛要集經》殘片 14 片，紙本。中署有『元康六年』（西元 296 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漢文寫本，外觀呈黃褐色，有墨線界欄，經文書體自然、墨色濃郁，尚有明顯的隸書韻味。吐峪溝出土，照片見《西域考古圖譜》（下卷）。大谷探檢隊獲得的文物後散存中國旅順博物館、韓國中央國立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龍谷大學等處。《諸佛要集經》殘片原件，現經專家整理存於旅順博物館。

中國書法之發展，秦漢以來由篆轉隸，魏晉則是隸書轉向楷書的轉型時期，隋唐則進入正楷確立的書法全盛時期。傳世文獻多賴碑帖、拓片，其實物可謂是墨林星鳳。敦煌數以萬計的寫卷，時代跨度正與晉魏、隋唐相契，寫卷書跡既有魏晉南北朝轉型期之隸楷、魏楷各型書體，提供考察隸書過渡到楷書發展歷程的實體資料；更有大量豐富正楷確立時期的隋唐寫經，可供比較分析唐代楷書大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柳公權、顏真卿等諸名家楷法之形態及其發展演變與影響。

許氏題跋中有論及北魏書法，如：青島市博物館藏《毗尼律藏》題跋云：「北朝人書尼律藏第二分卷第八，中無題識，以楮質、字體、書法證知為北朝所寫，且出元魏，非周齊也。樸鷲堅健，古味盎然。今人見一魏碑出土，輒駭汗相告，視此墨迹為何如乎。」，4. 安徽省博物館藏《大般涅槃經》題跋：「最精北朝周齊時寫經七十九行」「考其時代，當在元魏中葉以後，隋以前。何以明之？以他滿卷之有年代題記者證知。是紙質同、字體同，則時代同，灼然無疑也。予遊隴八年，先後得古寫經近二百經卷，唐最多，初唐即較希，隋以上尤希，其中精書更難得。此卷乃予所藏中最精品，整潔妍雅，筆筆如斷金截玉，得漢分之遺，而去元魏墓志造像記之獷，較世傳之小隋碑古樸過之。此一千數百年前墨跡，真所謂世之鴻寶。」按：「斷金截玉」乃書法史論形容魏碑之特色，操筆如刀，剛健雄強、有斷金截玉之爽利。漢分指的是漢隸，正說明北魏書法由漢隸過渡到楷書所謂魏楷的特色。

許氏論及隋唐寫卷的書法，精闢且頗自得。其中論及隋代書法，如：6. 中國國

家圖書館藏 BD14635《增壹阿含經》題跋云：「敦皇石室寫經，以他卷之有年代題識者，正其楮質字體，定為隋人書。隋書集南北大成，有宋梁之媚麗而兼元魏、周、齊之廉悍，最為可貴。此卷鑄金截玉，精光逼人，當是開皇初所為。氣味之厚，自非唐代書家所能夢見，尤足珍也。」又 10. 浙江省藏浙敦 029《太子慕魄經》題跋云：「鳴沙秘寶 隨開皇九年皇后造《太子慕魄經》，考敦皇石室所出寫經，以隋為最精。為書法至隋，集南北之大成，別有一種沖和廉穆態度，迥非唐人可及。此卷出自椒房，尤為異寶。」又隋人書《十輪經》題跋中，說：「此紙雅秀蒼勁，可敵世傳張波、元公、尉富娘諸隋志，然彼乃拓本，此為千餘年前之寶墨，尤可珍異。」「余意隋書實集南北大成，儀態天然而古味深厚。初唐以降即稍漓矣。晉人小楷俱出唐摹，唐宗虞、褚仍在隋後，此紙乃虞、褚先河，亦即真書鼻祖也。」

按：張波墓誌、元公墓誌及尉富娘墓誌，并為隋大業十一年(615)刻¹¹，書法結字茂密，字形方正規整，結體嚴謹，風格古樸，有北魏書法遺風，是隋代墓誌之精品。許氏以為敦煌《十輪經》寫本雅秀蒼勁，與所舉三隋代墓誌相匹敵，而書法風格均已融南北書風于一體，可說開唐代書法之先導。敦煌《十輪經》寫本為千餘年前之寶墨，較諸墓志拓本，尤可珍異。此隋人寫本蓋由晉魏隸楷朝向正楷發展，實是真書之鼻祖，開唐代楷書正宗虞世南、褚遂良等之先河。

至於有關唐人寫經之書法，許氏特重書風之轉變。其在 1. 安徽省博物館藏《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跋云：「書法至唐一大變，古樸之意離，而勁銳之鋒露，此卷筋骨峭健，的為唐人佳品。」又 13.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117《妙法蓮華經》題跋也云：「唐顯慶五年沙門重遷造《妙法蓮華經》，敦煌莫高窟所出。楮質良好，書法精密。初變隋人之沖和雅澹，而為廉悍勁折。於虞、褚外，別闢途徑。決為士大夫書，非經生手筆。所見有蕭大嚴居士寫經及上元官造經，差可方駕。」

按：四川博物院藏 SCM.d.02411《妙法蓮華經》尾題「妙法蓮華經卷第六」，楷書，書法極佳。後署「菩薩戒弟子蕭大嚴敬造，第八百九十八部」卷尾背面「川西人民博物館藏品」題簽。啟功鑒定為唐代原裝寫經，時間為武周至開元間¹²。

上元官造經，指唐高宗上元年間官府寫經生抄造的佛教經典。唐高宗李治用「上元」年號，僅二年三個月，時間從 674 年 8 月至 676 年 11 月。此時官府抄造經書率由秘書省或門下省的「書手」擔任，或稱「群書手」，或稱「楷書」。例如：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70《金剛般若經》卷末題記署有：「上元二年三月廿二日秘書省楷書賈敬本寫。」；S.1456《妙法蓮華經卷第五》卷末題記署有：「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書省楷書孫玄爽寫」等，是屬秘書省楷書手所抄造的；又如：杏雨書屋羽 6《妙法蓮華經卷

¹¹ 《隋張波墓誌》并蓋「隋大業十一年(615)三月十一日卒，廿二日葬」。《隋元公墓誌銘》，隋大業十一年(615年)刻。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在陝西咸甯(現今西安市)出土。《尉富娘墓誌》，隋大業十一年(615年)刻。清同治年間于陝西長安出土，現藏上海博物館。

¹² 林玉、董華鋒〈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敘錄〉，《敦煌研究》2013：2，2013.4，頁 47。

第四》卷末題記署有：「上元二年十月廿八日門下省群書手公孫仁約寫」、S.3361《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卷末題記署有：「上元三年七月廿八日門下省書手袁元愬寫」等，則屬門下省楷書手所抄造。

(四) 書法風格與用紙有助寫卷斷代之參考

敦煌寫卷相較於傳世文獻典籍，時間跨度長，每多缺前少後，既無書題亦無作者，又多乏紀年，是其特色，也是研究的難點與誤區。寫卷的年代，關係著寫卷的價值，其中寫卷題記有年代的，可明確作為寫卷年代的判定依據，但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寫卷沒有明確年代題記以為判準，因此寫卷的斷代也就成為敦煌文獻研究基礎且希望能解決的重要問題，是最複雜且極具落差的難題。

關於寫本時代的鑑定，從歷來學者的經驗中，可知寫卷斷代需借助寫卷的內容與外型，乃至寫卷流傳的履歷。除了寫卷內容，寫卷外貌，學界主要從紙張、書跡進行考察，且已有良好的經驗。其中書跡方面，包含：行款、書法、避諱、武后新字、俗字等線索；紙張方面，則有：物質分析、厚度、面積、簾紋、透光度等視角。其實各個面向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也有其盲點；不可憑著單一的面向逕行斷代，當廣採各種不同面向分析的結果，參伍錯綜，尋求最大的交集，當可獲致寫卷時代較為可靠的判斷。這些參考要項再加上寫卷流傳的過程，又可作為寫卷真偽的判準。

梁·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中國古代文士收藏家，頗多對歷代書畫見多識廣者，更多自幼習書，精擅各體書法，熟悉名家書跡者。許承堯即是清末民初的書法家、收藏家。其斥資蒐羅敦煌寫卷書法精品，即基於酷愛晉唐書法。因此，每將訪購所得之書法精品，或有緣得以寓目之晉唐書寫卷佳品，施以題跋，以為品題鑑賞。青島市博物館藏《毗尼律藏》題跋有云：「北朝人書尼律藏第二分卷第八，中無題識，以楮質、字體、書法證知為北朝所寫，且出元魏，非周齊也。樸鷲堅健，古味盎然。今人見一魏碑出土，輒駭汗相告，視此墨迹為何如乎。」從此題跋內容，吾人可以窺見許承堯對敦煌寫卷書法評賞之精到，其間亦稍涉敦煌寫卷斷代，頗具研究之參考價值。又 21. 許承堯贈唐式遵寫卷題跋：「右敦煌鳴沙山千佛洞寫經卅九行，校其時代，當出隋唐時人所寫，紙為硬黃，而較盛唐為薄。用筆堅重，結構嚴緊，尚帶周齊遺意，下開唐風，此虞、褚以前之楷書，吾國千餘年前之寶墨也。嘗疑世所傳晉人楷書決非真跡，當出唐人虞、褚輩潤色裝點，以楷書至隋，始和合南北，別開面目，乃有妍逸之觀，如元公墓志等是已，在晉時不應有此。自敦煌寫經書遂可證實吾說，推翻自唐宋以來書家舊案，誠一大快事也。試觀此紙，更取晉帖一校，即可證入。」在在顯示出許氏對晉唐書法由隸楷到真楷的遞嬗蛻變鑑賞與論斷之功力，亦可供寫卷斷代之參考。

除了書跡外，紙張也是斷代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許氏在 5.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4514《大般涅槃經》題跋有云：「唐人寫經四節 此硬黃紙寫經四節，書法韶秀，古趣盎然，不可多得之品也。」20.《救疾經》題跋也云：「此卷為唐人用硬紙書，書筆沉穆，古味盎然，首尾完全，頗不易得耳。」按：硬黃紙是唐代較名貴的藝術加工紙。因經過黃檗染色及塗蠟研光製作而成，質地堅韌而色澤較黃，因稱硬黃或黃硬。其優點在於易於久藏，光澤瑩滑，所以唐人多用以抄寫佛經。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辨》便說：「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避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

(作者為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